

浅谈郑振铎先生收藏的两种佛典的史料价值

李际宁

【摘要】郑振铎先生的藏书甚富，而对于佛教典籍的收藏更是明清以来众多收藏家难以企及的。本文介绍了郑振铎先生收藏的两件佛典，以揭示西谛所藏之佛典在文物文献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郑振铎 佛教典籍

郑振铎先生是著名的版本学家，在他一生收集、研究的古籍中，释家类典籍的收藏可谓丰富而系统，以笔者观察，他收藏的佛教典籍之宏富，是明清以来许多著名收藏家难以企及的。翻开《西谛书目》¹数一下，先生收藏的释家类典籍多到140余种。先生非常重视各种佛经版本的蒐集，重视佛教典籍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突出贡献。先生还重视佛教典籍的版画，他认为，宗教版画，特别是佛教版画，丰富了中国各个时期的版画艺术风格²。赵万里先生在总结郑振铎收藏历代版画的成就时说：“西谛对于历代版画书籍，有丰富的收藏和深邃的研究……他藏的宋版陀罗尼经、元版碛砂藏的扉画，以及明初北京出版的带有图象的佛教宣传小册子，线条刚柔兼施，刀法明快流利，代表着各个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³

笔者八十年代中期进馆以来，长期浸泡在国家图书馆的宏富藏书之中。出于专业爱好，非常关注西谛藏书中的佛教典籍，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常常感慨西谛藏书中佛教典籍的重要。值此先生诞辰110周年暨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的时刻，笔者不揣简陋，撰此小文，试举几例，简要介绍笔者学习西谛先生收藏的佛教典籍资料后得到的一点体会，以此揭示先生收藏品在文物、文献价值方面的重要价值，聊以寄托一个后来者对先生一生爱书聚书、以生命保护古籍、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崇高品德的景仰。

一

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 存一卷：七十三 臣三

（唐）释实叉难陀译

宋平江路碛砂延圣院刊大藏本⁴

本册为经折装，卷首有扉画，首题后版心下有人名“蒋达”。蒋达为宋代刊雕《碛砂藏》的刻工⁵，故本册当为宋版《碛砂藏》本。

本册最为重要的是卷首装配的扉画。该幅扉画一纸五半叶，其中三个半叶的主题是佛说法图，两半叶的主题反映的是元初在杭州大万寿寺校勘藏经的情况。扉画四周边框以蔓草纹为装饰，左边有一行题识：“都功德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杨琏真佳”。

以赞颂杨琏真佳为主题出现的版画，在古籍中非常罕见，以笔者调查经历，仅仅见到两种，另一种是几册零本《普宁藏》所附的“释迦牟尼供养图”⁶，在诸供养人的中，有两位人物做髻发状，其中一人的旁边，标注

¹ 《西谛书目》五卷（附题跋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² 郑振铎编著《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³ 赵万里《西谛书目序》，1963年6月，载《西谛书目》五卷（附题跋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⁴ 著录见《西谛书目》上卷第52叶，版本时代著录为“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并见《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1589页，版本时代著录为“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7年第1版。本件千字文编号“臣三”。

⁵ 刻工蒋达，见叶恭绰撰《碛砂延圣院小志》，载1935年上海宋版藏经《影印宋碛砂藏经》首册。

⁶ 有关杨琏真佳的扉画，见《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释家类《不空罽索陀罗尼经》，存卷上和《不空罽索心咒王经》，存卷上中；又见小川贯弑撰《光明禅师施入经典とその扉絵》，载《龙谷史坛》第三十号，他揭示并研究了1941年在山西

着“总统永福大师”字样。这位“总统永福大师”，就是前述《磻砂藏》扉画提到的“都功德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杨琏真佳”。

杨琏真佳的资料在学术史上有什么意义？杨琏真佳，亦作“杨辇真伽”、“杨琏真伽”⁷《元史》卷二百二记载：“有杨琏真加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唐、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南宋一朝以杭州为都城，杭州城周围南宋一代的文物古迹最丰富，几代宗室的陵墓，亦修在杭州绍兴一带。元人为了牢固统治江南地区，除了在治国政策上采取对汉族和江南地区人民残酷压迫以外，还采取了杨琏真佳的主意，开发宋陵，希冀从民族感情方面打击南宋故地人民对前朝的寄托，从根上“挖断”汉族统治世系的脉络。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一记载：“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有绍兴路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遂称亡宋陵墓，有金玉异宝，说诱杨总统，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将带河西僧人，部邻人匠丁夫，前来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割破棺槨，尽取宝货，不计其数。又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载取宝货，回至迎恩门。有省台所委官拦挡不住，亦有台察陈言，不见施行。其宗允、宗恺并杨总统等发掘得志，又于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来，将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发掘，劫取宝货，毁弃骸骨。其下本路文书，只言争寺地界，并不曾说开发坟墓，因此江南掘坟大起，而天下无不发之墓矣。”《明史》卷二八五：“夏人杨辇真伽为江南总摄，悉掘徽宗以下诸陵，攫取金宝，哀帝后遗骨，瘞于杭之故宫，筑浮屠其上，名曰‘镇南’，以示魔胜，又截理宗颅骨为饮器。”《新元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一百四十四释老记载：“有杨琏真伽者，世祖为江南释教总统，掘赵氏诸陵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货无算；其壤夺盗取者，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址两、钞一十一万六行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乾二万三千户。”

杨琏真佳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忽必烈的宗教政策有关，利用各宗教之间的关系，达到巩固元朝统治者的目的，这个政策的标志，充分体现在元朝政府封藏族佛教大师胆巴为“国师”，封杨琏真佳为“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挖掘宋陵后，又在宋代宫禁内修造佛塔。明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第七卷“报国寺”条下记：“报国寺，元至元十三年，从胡僧杨琏真佳请，即宋故内建五寺，曰报国、曰兴元、曰般若、曰仙林、曰尊胜。”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杨琏真佳废宋韦太后所建四圣延祥观，改为了万寿寺。万寿寺在有元一代曾经有过重要的活动，著名的河西字大藏经，就是在这里刊雕完毕。国家图书馆藏磻砂藏本《大宗地玄文本论》卷第三卷尾有大德十年宣授松江府僧录管主八题记曰：“管主八……钦覩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馀卷，《华严》诸杆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馀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馀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馀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装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伞盖》三十馀件、经咒各千馀部，散施土蕃等处，流通读诵。”这里管主八所谓之“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板”一事，就是郑振铎先生收藏之《磻砂藏》本开篇扉画中所描述的情景，这个万寿寺，就是杨琏真佳废宋四圣延祥观改建的。

西夏崇尚佛教，西夏国时期，多代统治者刊雕西夏文佛教大藏经，事未竟而西夏国亡，一直到大德年间，重在杭州大万寿寺开板，续修西夏文大藏经及其他零种佛典。据史金波研究，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有题款“实勾管作选字出力者”，这个“选字出力者”就是拣排活字的工匠。日本收藏之《大

崇善寺收藏的《普宁藏》“邛十二”《舍利弗阿毗昙论》卷十二中所附有关杨琏真佳的扉画。

⁷ 有关杨琏真佳的研究，见陈高华《略论杨琏真加和杨暗普父子》，原载《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又见《元史研究论稿》，1991年12月，中华书局。

方广佛华严经》卷五，有题款两行，史金波翻译为：“都发令雕碎字、勾管作印者都罗慧性，复共一切发愿助随喜者，皆当共成佛道。”“雕碎字”者，即指造活字。过去，史料中有关记载在杭州刊雕西夏文大藏经的资料甚少，而郑先生收藏的这幅版画，正细致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在杭州大万寿寺刊雕大藏经的情景，异常宝贵。

另外，有关杨琏真佳的族属问题，曾经在史学界有过争论，陈高华先生持西夏人说。他的观点，现在被大多数学者支持。他认为：“杨氏应是河西唐兀人。”他认为元代畏兀儿名诗人贯云石在《道隆观记》中所说“河西祝发杨永福总摄江南僧政”，明言杨琏真佳为河西人，即西夏人。笔者非常同意陈先生的观点。笔者在此仅补一例。前此我们曾经介绍了国家图书馆等单位收藏的《普宁藏》的扉画，图中有“髡发”，旁边提“总统永福大师”者，这个人就是杨琏真佳，而髡发是西夏人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这也可以解释，何以杨琏真佳如此热心河西字大藏经的补刊工程。

郑振铎先生收藏的本册《大方广佛华严经》，不仅史料价值高，而且同样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我们知道，《磧砂藏》嘉定九年（1216）开雕，初始阶段雕版事业进展颇慢。这个时期，一些早期刊雕的大经，比如《大般若波罗蜜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陆续被请印流传。宝祐六年（1258），磧砂延圣寺发生火灾，寺内建筑大部分被烧毁，惟独忏殿和寂堂和尚舍利塔未火。这次大火给大藏经雕板印刷事业的打击非常严重，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存留的《磧砂藏》南宋原版《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经板，几乎就在这次火中全部烧毁。

咸淳（1266—1274）初，主持僧可枢化缘修复寺院，不久又恢复了刻经活动。但是没有多久，公元1279年，蒙古大军南下，南宋灭亡。朝代更替，人民涂炭，磧砂延圣院的刊经活动暂时停止了。直到大德元年以后，刊经活动才断断续续地恢复起来。原来烧毁缺板的部分，用距离磧砂延圣院不远的妙严寺本配补。今天，全世界仅存五部比较完整的《磧砂藏》，而这五部，根据已经得到的信息，全部都是明代初年配补本，而配补的部分，主要就是宝祐六年大火烧毁的几部大经，如《大般若经》、《华严经》等。故尔此后流传的《磧砂藏》，不论整藏或是零本，几乎都是这个配补大藏本。而郑振铎先生独具慧眼，收藏到这一册宋版《华严》，可谓价值连城。

二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八十 存一卷：四十八 千字文号“育”

（唐）释实叉难陀译

明建文年间杭州天龙禅寺刊本

本册磁青封面，经折装。经名笺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等八字。经文每纸五个半页，半页六行，上下单边。通卷经文句读，卷尾有经文句义。卷首有扉画，扉画一纸五个半页，为供养图。图画中间释迦牟尼高坐莲花宝座，双手微微平举，宝座前有二供养人。释迦牟尼左右各一人，手执如意，坐莲花台上，此或即天台宗所立三身佛，两侧各有数名弟子及供养菩萨。人物线条细腻流畅，面目表情栩栩如生。边框左下角刊雕画工姓名籍贯“鉴湖张敬书”。扉画之次缀接半页纸，印有万岁龙牌，牌上楷书大字“皇帝万万岁”。

此经版本，胡适先生称为“天龙山藏经”。《天龙山藏经》过去未为学界瞭解。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胡适先生在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书库担任库长期间，对该书库收藏的原北京大悲寺藏《磧砂版大藏经》进行了调查，发现该馆收藏的《磧砂藏》中配补有明代建文帝元年（1399）刊本佛教藏经——《天龙山藏》。胡适先生在他的《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库藏的磧砂藏经原本》一文中介绍了这部佛典：“配补的明本之中，还有建文元年己卯刻的《天龙山藏经》。因为成祖要毁灭建文一代的事实，故建文两字都被挖去了，只剩元年己卯的纪年。这是很少见的史料。”⁸胡适关于《天龙山藏经》的介绍，只有这么几句。在他的这篇文章发

⁸ 胡适《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库藏的磧砂藏经原本》，载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台北，大乘文

表以前，学界未见有关这部藏经的任何介绍。而他的这篇文章，也是迄今为止研究《天龙山藏经》的唯一的论述，因此，更显郑振铎先生收藏品的重要。

巧合的是，国家图书馆也收藏着十二册《天龙山藏经》零本：卷一、卷二、卷四、卷五、卷七十二、卷七十四、卷七十五、卷七十六、卷七十八、卷七十九、卷八十。版本学的一个方法是比较，即用相关版本相互比较，往往能够“拼凑”出已经零星破碎的、被遗忘的资料。当我们把这些相关资料信息“凑”在一起，这些版本的史学价值就慢慢显示了出来。

国家图书馆《华严经》卷一尾题后的牌记，记载了该经的主持者和开雕地点。该牌记为莲花底座，上覆荷叶。牌记内有三行文字：

“谨募众缘，重刊大经全部，功德仰祝/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正教流通，众生饶益者。/元年己卯岁春，天龙禅寺主持比丘行满敬识/。”

牌记边框外右侧刊“板留杭州府城南天龙寺”，左侧刊“余姚夏伯坚刻”。

根据牌记知道，比丘行满是天龙禅寺的主持。释行满，历代僧史传记不载，其活动时期及刊经史事亦不详。从这些题记看，这部藏经的主持者就是这位杭州府城南西湖南山天龙禅寺的僧行满。元末明初著名学者徐一夔《始丰稿》有“天龙禅寺记”一篇，记述颇详：“寺在慈云岭之阳，后据龙山，前挹浙江，幽复萧洒。唐真觉禅师卓锡于此，始建道场。……钱武肃王时，欲广禅舍，乃新兹寺以居镜清禅师……宋大中祥符三年，改寺额为感业……建炎三年毁于兵，惟木观音像在。绍兴十三年建圜坛，以净明寺为斋宫寺临净明，岁时侍从斋宿僧徒勿便，多散处它处，寺亦日久入于废。……泰定三年，迁寺于旧基之东若干步，即宋郊祀时侍从斋宿地也。……今住山行满既加涂墍，寺视旧益新。……”

《天龙山藏经》在刊刻过程中，得到了广大信众的支持。助缘刊经者，主要是本府钱塘县、仁和县信徒与寺户，也有其它地区的助缘百姓。如卷七十六题记载助刊者：

仁和县居住善人贺氏妙坚、何氏妙善、徐氏妙林、传寿、钱氏七娘、朱氏妙善、管氏妙真、蒋觉圆、李士贤、董氏妙坚、蔡氏妙宁、陈实、郑氏妙缘、王氏妙真、陈氏妙莲；海宁章广诚、胡氏妙安、凌氏四娘、沈氏三娘、吴亮、葛文名、章嗣良、周氏妙福、张士亮、凌氏妙济、严氏妙真；湖州归安范氏一娘；各施净财，助刊此经，同增见世福田，共证来生妙果者。

又如卷七十七题记载，仅天龙禅寺本寺的助刊净人就达二十三人。助刊者还有寺院僧人，如卷二题记：“京都僧录司左觉义鸡鸣禅寺住山定岩净戒助刊。”当时助刊的范围并不大，主要是杭州府附近的百姓。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次刊经活动的影响并不大。

《天龙山藏经》的开雕时间，根据卷一“元年己卯岁春”的提法，可以肯定在明代建文帝元年。这个年号还见于七十二题记“元年己卯正月吉辰天龙住山行满题”，以及卷八十题记：“元年己卯春天龙住山行满题”等。至于《天龙山藏经》板片刊刻完毕时间，由于现有数据较少，没有明确记载，故尚难确定。

《天龙山藏经》是“小藏”，主要根据就是其卷一牌记的“重刊大经全部”一句。根据方广锜先生的观点，判断一部藏经需本三个基本要素：其一是入藏经典的取舍标准，其二是组织藏典的结构体系，其三是反映藏典结构的外部标志ⁱ。依照此一标准，《天龙山藏经》在经典的组织上是经过取舍的，所取者就是“大经全部”，也就是说，该藏应该也是以四大部为基本主体而组织起来的，应该是“小部藏典”。北京图书馆这十二册《大方广佛华严经》，有千字文编号，卷一编为“拱一”，卷八十编号“臣十”。这个千字文编号与宋元明以来几部主要大藏经相同，反映了《天龙山藏经》与大藏经的关系。翻刻，袭用大藏经千字文，以为自身组织结构体系，是“小部藏典”共有的现象。另外，根据其牌记“版藏某某处”的说法，该经藏应该已经刊雕完成，规模结构

化出版社，1977年6月初版。

应该已经固定，这应该是一部完整的“小部藏经”。因而可以说《天龙山藏经》将是继南宋景定陆道元藏本、元陈觉琳报恩寺万寿堂本、元吴兴妙严寺本等小部藏经以外的又一部新的“小藏”，它在藏经史上将有特殊的意义。当然，其规模、结构到底如何，还有待发现更多的新资料。

《天龙山藏经》最重要的史料价值在于它的刊雕年款，由于明代初年“靖难之变”，永乐皇帝为了消除建文的影响，凡是有关建文帝的资料，尽量销毁，凡是有建文年号字迹者，“建文”年号悉皆删去，只留下“元年己卯”纪年字样。这就是今天我们很难见到明初建文时代文物的因素。由此，我们更佩服郑振铎先生，当年他可能并没有机会查阅有关资料，更没有见到普林斯敦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资料，但是，先生凭借他的“眼光”，收集到这件稀见珍籍，保留至今，实在难得。

笔者从郑先生收藏品中获益良多，在此仅举两例，以见先生收藏品之重要。仅撰此小文，以为纪念。